

——体育新闻

评论纲要

瞿 巍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体育新闻评论纲要/瞿巍著.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5. 4

ISBN 978 - 7 - 5100 - 9620 - 4

I. ①体… II. ①瞿… III. ①体育 - 评论性新闻
IV. ①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2584 号

体育新闻评论纲要

责任编辑: 钟加萍

责任技编: 刘上锦 余坤泽

封面设计: 梁嘉欣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 510300)

电 话: (020) 84460421

[http: //www. gdst. com. cn.](http://www.gdst.com.cn)

E-mail: [pub@gdst. com. cn](mailto:pub@gdst.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规 格: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00 千

印 张: 4.5

ISBN 978 - 7 - 5100 - 9620 - 4/G · 1846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先是，初入高校，系内人员奇缺，不意有课如此。诏旨天来，不遑他辞。受命之后，中室彷徨。此类课程，例无所谓教材，亦未有前人涉足其间。参照所谓新闻评论旧有体例，照猫画虎，固宜且易也，然终不免类犬之讥，更无以昭示体育新闻评论之独立性格。此类评论，范围既小，体例亦殊。说者连篇累牍，煌煌大言，虽邀于时誉，然颇有张大事功、蹈陈履腐、空言无当之疑。乃以小处切入，以问题串联，发扬精义，独立成章，缀成讲义一函。三尺之田，无为苦乐，稻粱之谋，亦已焉哉！

是为序。

2014 年冬

序

1

体育新闻评论文化品格论 / 01

2

体育新闻评论风格流变论 / 17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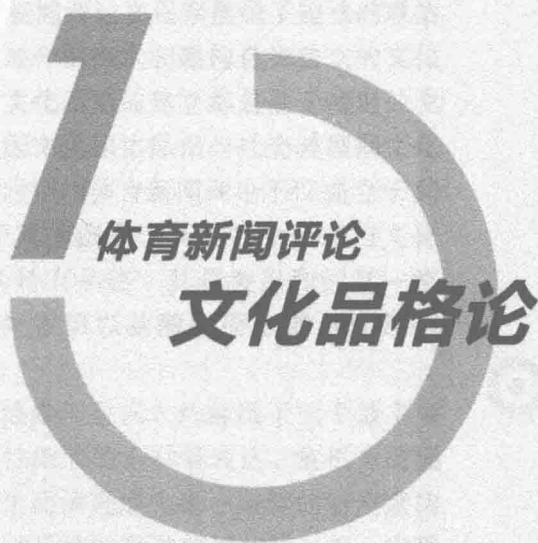
体育新闻评论流派论 / 29

4

电视体育新闻评论 / 65

5

网络体育新闻评论 / 99



15

体育新闻评论
文化品格论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基于意识与价值形态重构和社会现代化进程大背景之下的体育新闻评论在逐渐摆脱了超验的政治意识形态之后, 非常无意识地开始探索和建构自身独立的文化品格。毋庸置疑的是, 任何文化品格的建立都是基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型之下, 中国文化原生品格与社会转型期文化观念与制度特征赋予了这个时期的体育新闻评论不仅独立于其他新闻评论形态, 也独立于其他国家、其他社会形态与文化背景之下的体育新闻评论的特有品格, 其最突出和别具一格的特征就是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制度建构冲动。

国内体育新闻评论的政治参与意识大约经历了三个最主要的时期, 即非制度化的技术性细节的不对等表达、危机下的无法压抑的制度抗辩和冲击、进而演进成为毫不掩饰的制度重构的主动参与, 勾画出一条显而易见的渐进的情节线, 并一定程度上暗合于所处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演进线索。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日趋指向制度内核的政治参与意志的产生和演进不仅与社会思潮和文化背景、评论人的主动精神直接相关, 也与看似处于历史主动地位的权力阶层对变化不居的社会意识更新的麻木、现代政治意识缺失、政治智慧低下、对既得利益的过度贪婪和对权力的过度执着等原因有直接的关联。正如历史所显示的那样, 这些权力阶层对利益与权力的独占和贪婪以及政治上的颀预与弱智实际上总是与他们预期相反的成为更为触动制度内核的变革的导引和动力。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体育新闻评论是以一种以技术性的、低层位和非对等的表达出现的，富于强烈的中国文化特征，即在表达内容上，表达者经过了事先的精心选择和主动的回避，这使他们的表达保持着良好的分寸感。在内容上，他们的表达更多集中于体育技术类细节的讨论，而几乎从来不直接指向有关制度性构架等内核层面。这种情形一部分源于对制度性构架问题缺乏较为明晰的认知，且制度性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尚未进入主流文化语境，一部分则来源于对制度性构架的传统敬畏和由此导致的主动间离。在那个时代里，制度以及相关的问题依旧是知识分子们乃至全社会的苦难记忆，这使他们不自觉地选择了主动回避；在表达态度上，表达者（评论人）与对方存在先天的身份的不对等关系，这种不对等甚至存在于表达者本人的意识之中；在表达后果上，表达者对于表达结果根本无法预知，他们无法通过有效的程序化渠道达成自我表达对权力决策的功能性影响，表达内容是否被接受全然决定于受者的个人意志。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表达本身，而不是表达的内容，成为了体育新闻评论人这个时期所有重要表达的终极目的。以上情形在传统文化背景下表述为“谏”的形态。这种表达内容的有限性、身份的不对等和表达后果的不可预知使这个时期的表达虽然一定程度上依旧非常朦胧地体现出体育新闻评论的政治参与渴望，但是从更高的层面上看，甚至不具备现代意义上政治参与的一些基本因子。

这种表达起始于如教练选择、赛事指挥、赛事组织等最纯粹的技术性细节的温和建议，并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无论是主要内容还是表达的态度、方式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如一些评论人对足协为中国选择洋教练霍顿的批评。霍顿在中国足球队开始执教的最初起，一些评论就立场鲜明地反对他的执教方式，明确预言其战术不适合中国队，其执教能力无法带领中国队进入世界杯。

霍顿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极力鼓吹的442这一世界先进打法，而与其说是霍顿的水平高不如说中国足球的水平低，放眼中国足球的甲A甲B赛场没有哪个队真正掌握了442的精髓，而仅仅是布阵上的简单模仿，而霍顿拿442来唬人也是成功的，侃得中国足球人晕晕乎乎。霍顿曾经引以为荣的“世界上最先进的442”，在最后的绝唱中却被巴林的几位年青队员轻易地化解。^①

值得注意的是，霍顿的出现已经不像新时期中国足球最早的洋教练施拉普纳那样赢得了一味和一致的喝彩，而是被评论人首先开始置疑，这体现了体育新闻评论人先天的独立精神和那个时候还处于朦胧状态的参与意志。但是，这些表达依旧还是局限在教练的个人战术水平等技术性问题之中。对于国内体育评论来说，这样的表达仅仅还是一个开端，远远谈不上构建自身独立的文化品格，但这是一个并不平庸的开端，因为任何的置疑虽然未必都意味着重构，但任何的重构则必须以置疑为肇始。而在此之中所体现的体育新闻评论人的自主的表达精神

^① 周文渊. 1999年：霍顿？唉，霍顿！[DB/OL]. <http://www.sina.com.cn/2001/10/31>.



则是构建其独立品格必不可少的前提。有趣的是，在其他文化背景之下，这种表达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方式上其实正是体育新闻评论最原生和最重要的形态，但它却仅仅是国内体育新闻评论的出发点。

二、

6

虽然体育评论人在诸如主教练、联赛赛制、假球黑哨治理等等技术性问题上都表示了自己的质疑并提出了修正建议，但是这些质疑和建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采纳。不幸的是，重大赛事一个接一个的失败、联赛质量和影响力的不断走低不仅不断证明着评论人的敏锐与独到，也证明了旧有的“谏”形态的表达的彻底失效。落后和失败使“救亡”的主题变得前所未有的紧迫和令人激动，而它所导致的不满正在以其自有的方式不断滋长和蔓延，变革已经不容回避。

但是，权力组织担忧这种变革而导致利益和权力受到削弱。这种担忧使他们本能地固守于旧有的格局，拒绝、压制并相信可以通过威权对民间表达的拒绝和压制阻止任何可能的变革企图。于是，渴望发生变革的愿望、必须有所变革的现实和这种变革又实际上无法发生使表达者失望、不满和期待，这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强化了体育评论人的政治参与情结和对决策结果的主动干预性的更为热切的要求，而一定意义上的开放社会所导致的个人意志日趋高涨也使得表达的基本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样，伴随着失望、不满、期待和“谏”形态的表达失效，更为强烈的置疑声此起彼伏地响起，对制度的信任危

机随即出现，主动性参与趋向在表达中开始明晰，制度变革的要求终于不可避免地被提出并且不断积聚。从这里开始，评论人政治参与的主动精神和热情真正萌发起来，国内体育新闻评论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是：技术性细节问题已经不再成为质疑的首要目标，问题终于直接指向了制度的内核。评论人的表达也随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评论内容上，不再局限于一般技术性细节批判而是直接指向制度批判，而制度批判的历史梦魇的重负也被他们主动卸除；评论的态度上，虽然表达中身份的不对等依旧明显，但表达者自身的不对等意识却大大淡化，并且不断以各种方式寻求某种对等的对话；在表达结果上，虽然制度的约束使表达的后果依然令人遗憾的不可预知，但表达者在力图以最大范围的自主表达来影响最终的结果；有时这些评论人甚至不惜跨越自己的行为边界，打破通常的角色定位，以更为主动的直接行动方式延伸表达的内容（如杨明、方益波进行的黑哨调查），并期待这种直接干预事件发展进程的超表达方式能引发对象的主动行为，达成对制度缺陷有效的补益。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以行动方式延伸的表达已经超越了新闻人职业的底线，混淆了新闻人与执法者之间的职业行为标准，因此并不足为其他体育评论人在其他体育新闻事件中所效法。但从另外的一个侧面来看，这种超越表达的行动也高调地彰显了体育新闻评论人制度变革的急切与渴望以及高涨的独立意志与主动精神。表达者明晰和强烈的个体意志与表达内容所蕴含的丰满的制度指向体现了表达者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标志着这个时期的体育新闻评论开始真正构建自己独立的文化品格。充满着道德批判和信任危机感的 2002 年的足坛黑哨事件期间的评论成为了这个时期最著名的案例：



正剧的喜悦和闹剧的滑稽交织，构成了中国足球历史上最令人激赏的一幕。当阎主席在声色俱厉地声讨着假球的危害时，我们还以为中国足球终于可以开始干净起来了，而当张吉龙在煞有介事地表示着对假球的愤慨时，我们却分明看到了中国足协的无奈和无能！

……在正义的幌子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对公平的亵渎！^①

第一，龚建平案件终将有一个结果，但因此而产生的影响却永远不会在记忆中消失。一代又一代的体育人始终要面对今天的疼痛，一代又一代关心体育事业的人们始终要牢记今天的教训，在教训中思索，在思索中前行。这次尚未终结的事件留给我们的首先是“信任危机”。

第二，对中国足球主管机构的信任感逐渐淡漠。在至今为止的整个过程中，和众多呼吁司法介入体育反腐败的各界人士相比，中国足球的主管部门反应被动，至少是缺乏与外界的良好沟通而给人一种失望的感觉。^②

首先是公众对足协的信任危机。阎世铎曾多次公开表示：这次反黑如不了了之，中国足协将没能力再领导中国足球。公众曾对足协反黑的强硬态度寄予莫大希望，但裁判名单出台后，球迷深感不解。有球迷说：“足协打黑本身就是一场天大的假球，我们再一次被愚弄了！”也有球迷认为：“陈培德的话灵验了，黑哨与足协的黑官都是一伙的，谁打谁呀？”^③

① 鸿钧语，摆乌龙的足协 [DB/OL]，体育在线，2001. 10. 16.

② 方益波，以法律威严护体育公正，新华社，2002. 4. 28.

③ 彭青，留用黑哨是玩火，体育周报，2002. 2. 7.

三、

诸如 2002 年的信任危机等事件事实上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变革前景和变革契机，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期待中的改良并没有如愿降临，事件的结局甚至连评论人期待的最低愿景都没有达成。在整个黑哨事件中，除了一个龚建平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受到应有的制裁，而导致黑哨的体制上的问题几乎一个都没有解决。在历经艰辛和期待之后，公众和评论人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但是，（政治参与的强烈愿望）期待并不（会）因为不能实现而有所降低，而拒绝变革使旧有体制格局将其弊端以更为极端的方式演化。体制无法突破、旧有利益格局的不愿意放弃和权力组织缺乏基本的民主政治训练，导致体育新闻评论从对制度的置疑迅速而不可避免地升级到对制度重构的要求。此外，转型期时代社会意识的发展，开始逐步改变原生文化形态，特别是由于权利、自由意志的概念在不断泛化和普世（价值）化之后，原生文化形态的语境表达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评论人的自主和自觉意识进一步提升，以期实现一种更对等、更平权形态的主动性制度重构的表达。虽然这种表达由于体制缺陷和个人政治智慧的先天性缺失而导致最终结局的依旧不可预知。在黑哨事件两年之后，突然发难的 2004 年大连实德、北京国安、深圳健力宝等俱乐部等发起的“革命”终于毫不掩饰地要求中国足协让渡权力，成立中超联盟，这个行为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置疑，而是发展到权力体系的根本性重构。不可避免的，这个事件也必然使国内体育新闻评论经历了一次政治参



与意识的总爆发。

在讲话中，大连实德除了宣布坚决支持国安，与国安共进退外，还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推进中国足球的深化改革。在随后抛出的13份共几万字的文件中，徐明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纲领，核心就是夺足协的权——职业联赛的管理、经营、监督和分配之全权。

这已经不是改革而是革命或造反了。^①

制度的重构成为集中关注的头等大事：

有一点我们是不可以不明晰的，那就是现在对职业联赛经营和管理职权的分配，违背宪法有关保护合法私有财产、保障人权的内容。

有一点我们是不可以不明白的，他们可能不是“革命家”，但中国足球现在必须革命，必须出现革命家。如果是，那就烈火烹油，动用各种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那理论上也需要动用一切力量影响之作用之督促之，使之尽可能地进行革命，成为革命家。

如此则最后可能是政治学上的妥协，举事者和足协利益均衡，可能是踢开足协另起炉灶前途叵测，可能是或者其他的可能——但只要传统意义上巨大得公民无法与之对话的权力不再盘踞市场，只要自由经济的平台搭好，真正的革命总有一天能通过各种制衡的力量无限接近完成。

^① 周文渊，审判阎世铎，体坛周报，2004.11.26.

谁说10、20年就不是革命。^①

从以往的实践和教训看，单纯地依靠旧有的行政手段，用强制的力量压服“揭竿而起”的俱乐部，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也无益于事态的实质性解决。中国足协的根本之道在于“让利”——告别原有的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承认各足球俱乐部的主体地位与更多的自我管理权，和俱乐部平等商谈，签订彼此都能接受的利益共享条约。

在这点上，英足总的做法值得借鉴，有所为有所不为，从具体的事务性管理中退出，转为宏观调控，既充分地放权，又对俱乐部实施有效的监控，让足球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与增值。^②

制度批判锋芒毕露和毫不隐晦：

作为“阎世铎新政”的另一项核心工程，“中超”堪称是老阎精心设计和导演的一项政治阴谋和一场商业骗局。^③

另一方面，阎世铎依然奉行精英治国的传统思维，企图用行政的办法和力量去做那些应该由市场做的微观事务。当事情进展不顺利时，他自我反省的结论是：行政的权威还不够，资源的掌握还不多，因而必须追求最大的集权，最终走向独裁和

① 陆新之。激将实德！。体坛周报，2004.10.20。

② 实德义举背后的机密 [DB/OL]。http://news.xinhuanet.com/sports/2004/10/19/。

③ 周文渊。假大空阎世铎 [DB/OL]。http://sports.tom.com/1569/1573/20041125-474094.html。



专权。

11·17，不是中国足球的审判日，而是对阎世铎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体制的审判日。^①

这场“革命”虽然在其发起人那里可能实体意义大于象征意义，但是对于历经数次期待和失落的评论人来说，这两者几乎没有差别。在大多数体育评论人都不否认这些俱乐部的经济冲动，而其旗帜人物本身其实也并不具备一个革命者本该具备的道德正义形象的同时，评论人对他的认同更多地来源于对自主权力和政治参与精神的赞扬，将其看作是一个建立新秩序的同时具有实体和象征意义的行为，是改变旧有制度形态和政治话语多元化的启动。而这场革命事实上也触及了最核心的内容：参与与分配，即通过“革命”要求更多的“权”与“利”。很难说这些发起人的这种主要起始与经济述求的行为到底真正具备多少“革命”的自觉与正义，但是他们的半自主意识的行为既有某种经验性的命题也是某种演绎性的命题。从经验形态来说，这是他们在足球圈子多年的一个从形而下的经验体会升华而来的体验，但是，这一体验从事实上推动了对制度设计的实体重构的可能，并从道德上和公共正义上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认可。也正是这一点才真正触及了体育新闻评论人的神经，并诱发了他们以极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参与体制重建的鼓动与狂欢之中——虽然他们对可能的结局并不是没有预知和准备——这次震荡给体坛带来了制度重建迄今为止的最大期待，也给评论人带来了制度重构的高峰体验：不仅让他们在短时间内体验着

^① 周文渊. 假大空阎世铎 [DB/OL]. <http://sports.tom.com/1569/1573/20041125-474094.html>.